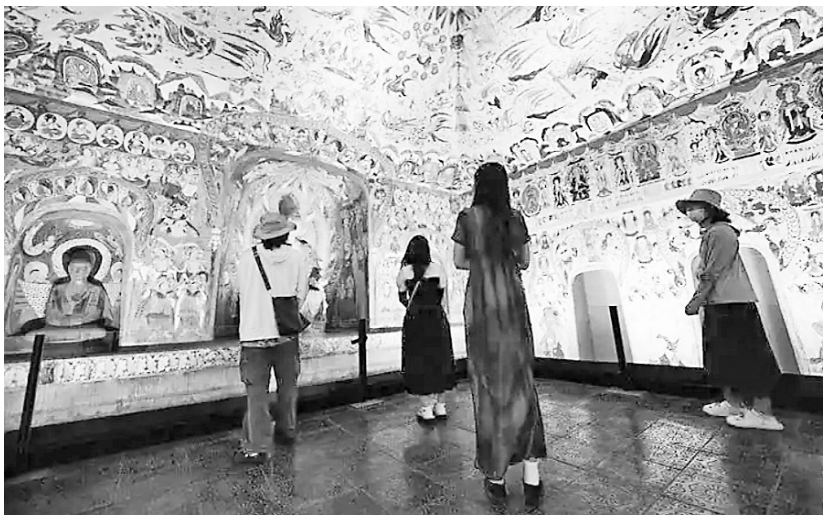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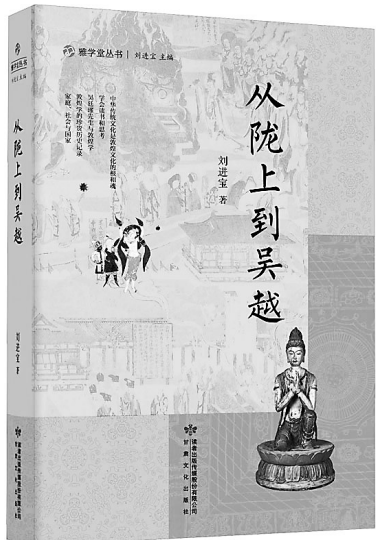




重推

一部别样的敦煌学术史

□ 马志立



游客参观莫高窟复制洞窟第276窟壁画。郎兵兵

近日读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的《从陇上到吴越》一书,百感交集。对于该书,我很难全面准确地加以介绍,只能略陈感想而已。

作为“雅学堂丛书”代序,《这一代学人的使命与担当》一文激情涌动。行文至编纂缘起时,刘进宝以朴实无华的语言介绍道,“雅学堂丛书”的作者“在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同时,还撰写了一些面向大众的学术短文、书序、书评和纪念文章等”。“这些文章没有太多的史料引文,语言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就《从陇上到吴越》而言,确实典雅而富有学问,既有故事性,又有可读性。

青年时期的刘进宝以《敦煌学述论》而知名,中年以后其所“从事高深学问研究”则包括归义军经济史和敦煌学术史。《从陇上到吴越》虽分三个板块:学术发言或盛会介绍,学者礼赞,书评或编后记,却可以整体视为作者的敦煌学术史或学者养成记。这是其一贯善于思考和勤于著述的延续。早在2016年《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出版之际,刘进宝便以《我与敦煌学》为题,回顾个人学习和研究敦煌学历程,写下三点感想:遇到了好老师,参加了一些集体的学术活动,坚持做自己的事。自述不无谦抑,却精准涵盖三个层面:学术传承,同仁交流,个人钻研,这在《从陇上到吴越》里随处可见。

从学术史的角度记述两次盛会,作者讲述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和中国唐史学会成立大会的情况,将会议背景和会议何以重要分析得头头是道,令人直呼长知识。以前者为例,作者饱含激情地写道,1982年在兰州、敦煌两地召开的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既有“科学的春天”到来、敦煌学复苏的大背景,又是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也是甘肃的敦煌文学研究者引领时代潮流、勇担敦煌学研究重任的表现。“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可见,作者是全国性的,研究范围是广泛的,论题是深入的,代表了当时国内敦煌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作者进而指出,这次盛会是改革开放后敦煌学界的第一次盛会,推动了全国学术团体的建立,团结了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学者,凝聚了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阅读至此,令人感叹“陇上人家”,着实豪迈。

参加学术会议对于研究工作的促进,作者于不经意间有所表述。1983年举办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首次敦煌学术讨论会时,作为会议承办方的

这是黄土高原上一个罕见的湿润臂弯,植被茂盛,环境宜人。周围都是连绵起伏的山脉,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均被拦腰阻断,风的势头削弱了,只剩下风的残兵败将掠过山脊,扑向低洼处的村庄。

古人很有眼光。借助地势,将长城或建在山梁上,或沿河而筑。有的劈山削崖,有的以沟为堑,只筑墩台;有的利用自然独立的险山作屏障,无须再筑城墙。如此,山势更险峻,长城更威严,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

如今,长城老去了,很多地方墙体已经坍塌,或者只存留几段土堆,偶尔有几个突兀的墙顶,但雄风犹在。站在高处,顺着山脊瞭望,依然能看到隐约起伏的城墙沿山势而下,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远方,隐入尘烟云雾中。

俯视眼前,断土层的黄土干净,呈灰白色,夯筑的土层痕迹清晰。两千多年前,在如此险峻的山梁上,仅靠人力和简陋工具,修筑起如此浩大的工程,确实是人间奇迹。很难想象当时的修筑场景,有多少人离家别子来到此处,他们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嘴里是否喊着打夯的号子。如果追求整齐划一的打夯节奏,那号子声一定会震天响,惊扰得周围的鸟雀叽叽喳喳,振翅高飞。

墙体上被光阴刻满了各种各样的图

青年,作者参与服务接待工作;1993年赴香港参加第34届亚洲北非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作者已经是受邀参会的学者了;作者自然主办过若干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和高层论坛,如《〈转型期的敦煌学〉》所言2006年的同名会议。这也是一个学者的成长史。

学术研究的同时,刘进宝格外注重学术普及。撰写《我们这代人的学问》《敦煌学记》之外,已主编“雅学堂丛书”两辑。这是其热心组织学术活动的自然延续,其所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收录五十余篇文章,均来自一对一的约稿。刘进宝是敦煌学的研究者,是敦煌学史的研究者,是热心而卓越的学术组织者。《从陇上到吴越》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了解四十年来敦煌学成就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窗口。

二

一个优秀学者的成长,个人努力自是应有之义,师长的引领也极为关键。《从陇上到吴越》给我的第二印象,是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部分可亲可敬的学者形象,直接回答了敦煌学何以繁荣如斯。刘进宝对

相关学者的深情回忆,除却人格魅力的揭示,更是表彰其学术贡献,这一切均可视作敦煌学史。

《正直的先生走了,精湛的学问长存》《一位纯粹、可敬的学者》《朱雷先生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认识的局限》均是作者对老师朱雷的深情追忆。这四篇文章,我几乎都是第一读者,且读过许多回,总是心潮难平。正是通过刘进宝的记述,我才第一次知悉朱雷是烈士遗孤的详情并深为震撼。《认识的局限》一文中,他自述毫不知晓朱雷先生对武侠小说如数家珍。作者透露在朱雷八秩荣诞时,呈送《我所了解的朱雷先生》一文,朱先生在标题末加上了“点滴”二字,令其不大理解。此事我从未听说过。巧合的是,再次重温《朱雷学记》所收13位弟子怀念文章,三篇标题不约而同均用了“点滴”二字,刘进宝使用的定语是“我所了解的”。这正应了一句古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位执着而耿直的学者》是对西北师范大学陈守忠教授的追忆。陈守忠是甘肃通渭人,直率而倔强,其西北史地之学,最得意之处是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紧密结合,结论自然真实而可信。陈守忠更



敦煌莫高窟。资料图

滴水藏海

长城湾

□ 翟 雄

案,把岁月的年轮呈现出来。树木长长的根茎从墙体上裸露出来,蜿蜒曲折,仿佛一条条灰白的蛇在游走。不知名的杂草旁逸斜出,绿意盎然。还有鲜花,红黄蓝白紫各色俱全,在绿丛的映衬下,格外显眼。那种对比很鲜明,不由人想起顾炎武的诗句: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古老的墙体上形成了深浅不一、大小不等的洞穴,如今成为鸟雀们温暖的窝,时不时地,孕育繁衍出毛茸茸的鲜活生命,它们把脑袋从洞里探出来东张西望,眼睛黑得像珍珠,叫声清脆悦耳。

不远处有几棵或卧或躺弯曲生长的大柳,至少有上百年历史。树身就像一条盘踞的巨蟒,两三个成年男子合抱不拢。树皮像古代将士征战的铠甲,龟裂粗糙。可以看出,当年由于树身太重,树干太粗,自身实在承受不住,某一天一阵

狂风刮起,大树就轰然倒下,被连根拔起,树干也开裂了。断裂处除了尖锐得像匕首一样的枝杈,还有一圈圈树木生长的年轮,格外明晰。多少年来,大树横卧在山脊上,不离不弃,默默地守护着、陪伴着长城。树根、树身上奇迹般又长出几棵柳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活灵活现地印证了刘禹锡的诗句——“病树前头万木春”。树身上有一两个巨洞,完全可藏一两个成年人。但是比起长城来,这几棵大树还是显得年轻多了。遥想当年,长城正值青春年华,这几棵大树或许还没有出现。直到过了很久,甚至几百年过去了,长城两边的人烟开始稠密,牧羊老人看到长城边上实在荒凉,或许就特意移来几棵树苗。一些树苗死去了,但终究活下来几棵。老汉十分高兴,摸着花白的胡须,拍拍土,浇浇水。树苗茁壮成长,终于成为参天大树。

最近反复翻看着一部令我眼前一亮的书——《党的出版故事》。我尤其喜爱它的封面,明亮又端正。后来得知该书甫一上市即引发好评,还获评年度“中国好书”。细品本书,我认为有三个特点值得引起读者和出版同仁关注。

一是鲜明的红色出版印记。本书从1921年建党前后写起直至当下,可谓是百多年党的出版史的概述,很多史实的爬梳与辨析让人颇受教益。这里既有那些耳熟能详的出版往事,也有对一些旧往故实的纠剔补证,更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史料发掘。如关于中共一大原始文件的俄文版、英文版经美国学者韦慕庭检读后公之于世;张人亚(1932年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局长)与其父亲对党的文件的生死相护;宋庆龄对《论持久战》海外推广传播的不遗余力与独特贡献;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早期出版历程的红色印迹和邹韬奋的赤子情怀;茅盾在建党初期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交通员”作用……如此鲜活的出版史料,勾起我们对出版传承思想文化的神圣使命的由衷感慨。

二是以纪事本末体撰述专题出版史。看完全书并听作者介绍,我们得知本书是对庆祝建党百年出版专题展的延伸与拓展,一事一专题并有纵向的延展阅读和史实铺叙,体例结构与篇章布局准确严谨。细读品赏又能够感受到文字饱满、洗练而不至于秀丽,再配以精美图片,使得本书图文并茂。那些动人的故事和感性的文字定会引发读者掩卷思考,感动于那些热血、激情、奔放的出版年代。

三是全方位呈现了党的出版工作传承思想、弘扬文化的重要作用。从建党之初的红色报刊到如今《中华人物故事汇》等出版物的推出,出版一直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彰显着出版业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功能。1931年8月,中央印刷厂成立,隶属于中央印刷局与中央出版局,承印《红色中华》等报刊。这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心和历史担当,是红色出版珍贵的见证。一方面,党的出版工作紧扣时代脉搏,如“三红一创”“青山

保林”记录了那些火热年代里的社会潮流与生活印迹。另一方面,党的出版工作也将视角置于泱泱华夏的浩瀚典籍,让中华文明瑰宝走到人民身边,为广大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二十四史”点校,《楚辞集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乃至《复兴文库》等反映的是新中国出版辉煌史迹,同样值得我们增添笔墨、挥毫抒写。

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出版故事》以出版文物的视角切入,以党的出版史铺陈,以故事的形态走到读者身边。出版故事活化了出版文物,出版文物则为纸质阅读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视觉体验。出版流淌在文明的长河里,经久不息。假以时日,编著者们仍可添加篇目,增加图片,甚至增加影像再现功能,修订成一部精装大开本,让出版故事以更具感染力的形态走到读者身边,更好地发挥弘扬传统、再现经典、总结记录党的出版历史与传统的重要功能。

《《党的出版故事》,尚莹莹、章泽峰、赵莹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评

慧眼读“物”

□ 扬之水

丁雨是讲故事的能手,先有《看展去》,继有《拾光纪》。后者是与前者风格一致的续篇,都是紧紧依傍考古学的知识,举重若轻,从容讲述展览中“物”与“人”的故事。

《拾光纪》的副题为“考古打开的时间胶囊”。它需要取得考古真经而又会讲故事的人向大众普及及不易明了的知识点。向沉默的玉琮王叩问身世,于是从造型和纹饰里听到良渚王在远古发出的声音,我们便看见了诸多玉器中明里暗里显示着社会的权力结构。良渚王的墓葬中,琮、璧、钺一应俱全,正表明他的大权在握。宽阔的城池,壮丽的宫殿,发达的人工水系,当然不是靠良渚王一个人或一族人就能创造出来,而靠的是良渚人的团结一致和人群背后的组织力。遗迹遗存展露出良渚社会的层次,暗示着社会中严密的制度。良渚的璧与琮后来都成为中国传统玉文化的核心,神人兽面纹中的兽面部分,正是青铜器饕餮纹的重要来源之一。“三代玉器与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不断被后人复盘仿效,良渚的这一缕玉魂,也随之绵延不绝”——原来满目琳琅的展品有着叙事逻辑,这里记述了不见于历史书写却充满独特魅力的一束文明之光。

古蜀文明虽曾在史书上留下一点痕迹,但形象模糊。面对出自三星堆的巨型青铜大面具,时空的悬隔,实在令人难以明了。丁雨信手拈来一首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顿时架起古今交通的桥梁。巨眼之外,“三星堆人用青铜制成了巨大的青铜轮形器以象

征太阳,制成了世所罕见的青铜树象征太阳的来路‘扶桑’和归处‘若木’。表现对太阳光明的感知,唯有用众多睁大的眼睛。而在虔诚的仰望中,这辉煌的光明似又能与眼睛交融,让眼睛本身也成为光明的象征。”循着这样的线索,我们看到了太阳,看到了神鸟,看到了构成三星堆人信仰表象背后权力分配的奥秘。再由此走向金沙遗址,“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中的故事有了起承转合,乃至在戛然而止中依然余音不绝。

“‘女媧造人’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上古神话。神话内容,虽然往往以想象为主,但想象总归是来源于生活。所以,女媧是否也有自己的现实原型呢?’玉出红山’,或许揭示了这种想象的一种来源。”画龙点睛的几句开场白,揭示了展览的亮点,以此贯穿始终,融入考古发掘的过程以及对遗迹与出土器物的解读,继而引出女媧与黄帝的“出身”,借助现代考古的智慧,一向在信史之外的远古神话,竟也能够参与文明史的叙事。

一双读“物”的慧眼在16个展览中指点江山,扶微扼要,俊快晓畅的文字读来自然是轻松的,间或点染的几分俏皮却绝无“戏说”的成分,而是句句不离考古的本色,更汇聚了当代学者的研究心得的诸多精要。

近些年常常被人问起应该何去何看展,我会说:丁雨的《看展去》和《拾光纪》是两本极好的入门书,字里行间去看展,一定不会宝山空回。

《《拾光纪》,丁雨著,天津出版社出版)